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3-0003-07

# 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以实践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为主导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后者对前者就无足轻重或原本就是相互抵触的。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诸多方面不仅增添了适合于目前时代特征的新方法、新范式、新思维,而且还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开辟了所不曾有的、未充分展开的新的自我生成之域,在方法论上创造性地构建了总体适应后现代社会发展之时代精神要求的新理念、新原则。因而,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近现代转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步性与共通性,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同向建构大大高于它们的异质背反,这无疑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西方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内在融通;实践指向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01

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领域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这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的各种方法论资源采取回避态度,没有在学科交叉、内在融合、科学实证与规范引导等方面有更深入探讨与建构,同时也没有对西方哲学学术前沿问题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开掘与梳理。<sup>[1]</sup> 其实,任何一种方法论研究,若割裂了自己与其他方法的内在关联,不仅极易脱离时代所需,而且会陷入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尴尬境地。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早已走出了固守单一方法论的绝对孤立的境地,并在共通融合之中激发了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的重新设计,认为只有海纳百川、相互借鉴,才能回到方法论研究自身、现实方法论上的理性自觉。<sup>[2]</sup> 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哲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存在本质区别又存在文化间距和理解误认,而且不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那样,无论外部实践抑或内部构建发生何种变化,其基本原则、

根本立场、思想精髓始终保持学理一贯,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更替极其频繁、错综复杂,且常常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种时髦周期的短暂性和易变性内在映现了其方法论本质上的脆弱与危机。但是,这种本质差别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就无足轻重或者原本就相互抵触,更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及其所蕴含的方法谋划严重限制了它们的深层通约与内在融通。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层结构中既固守一种社会实践本性,又固执于无产阶级文化品质的特殊申认,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它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只能采取拒斥的态度,只可接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浅表信念,一旦触及方法论深层,则极易采取逆向思维,伴随原有的方法论范式而顺向滑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所选择的方法论范式无论多么特殊,都不可能妨碍它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实现内在联手,它们在方法论

[收稿日期] 2014-04-11

[基金项目] 河南省人文社科研究中心资助课题(wj2014-G-2016);河南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项目(y131003)

[作者简介] 朱荣英(1963—),男,河南省尉氏县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上的通约与认同总是多于、高于世界观上的有距离的肯认与接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确需要找到与其他方法论足够多的共同点并实现内在契合与同向构建。正基于此,笔者不避愚拙,愿就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浅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 一、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以往,在方法论研究领域,我们曾经长期固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一元独大”、唯我独尊的格局,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不仅在世界观上终结了一切旧的哲学形态,而且在方法论上取缔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谋略;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其他方法论在实质上毫无相通之处,非但不能实现内在联手,犹如冰炭不能一炉,而且西方哲学方法论简直是一种“谬误的陈列馆”“通向诡辩的桥梁”“理性中最大的谬误”,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无论如何要拒斥西方哲学方法论对我们的无端干扰;西方哲学方法论早已日暮穷途,更遑论它能够喧宾夺主并独担重任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在思想界的大量引介,“中西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比较研究日见增多,以至于非比较研究成为不可能的了。此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二者极端对立的结论,不仅不敢苟同而且多有诟病,甚至暗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某种隐性批评。

首先让我们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情况作历史回顾。从古至今,西方哲学方法论设计不仅蔚为大观而且风格各异:一是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自知无知”的问答法(助产术),到柏拉图唯心主义“理念论”所说的“回忆法”,再到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形而上学”所讲的“四因法”,古希腊哲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上完成了方法论谋划的第一个小循环,奠定了西方哲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第一个文化轴心时期。二是从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知识就是力量”旗帜下所开创的归纳法,到笛卡尔《方法谈》在“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中所主张的“理性主义方法”,再到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经验主义方法”,西方近代哲学(为通达世界本体并为一切知识奠基)在认识论层面完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第2次循环,使

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真正具有了方法论上的保证。三是从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所陈述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之“主体论法”,到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所说的“自我设定非我”之“绝对论法”,再到黑格尔《逻辑学》所揭示的“实体即主体”之“唯心论法”,西方近代哲学晚期不仅在实践层面完成了方法论的新的跃迁,而且再次将辩证思维及其逻辑方法推向顶端,达到了以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为标志的第2个文化轴心期的高峰。四是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学派,从叔本华、尼采唯意志主义方法论所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价值就是一切”,再到狄尔泰、柏格森生命哲学方法论对生活价值的直觉体认,西方社会科学中的非理性方法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其特殊的方法论设计在价值观与认识论的统一上得到了明确肯认,使西方辩证思维方法论谱系中自觉地融入了大量的非理性色彩。五是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学派,从早期孔德、约翰·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其经验归纳法,到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新实在论、实效主义的实用主义方法的引入,再到科学哲学学派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历史分析的语言学分析方法的滥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性至上主义”“经验实证高于一切”的科学分析方法一再得以张扬。六是随着西方哲学方法论重大转折的现象学方法、诠释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兴起,介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学派之间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实现了一次大联盟、大融合,比如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方法、舍勒的人类学现象学方法、因伽尔登的美学现象学方法、利科的历史现象学方法、姚斯的接受美学现象学方法、阿伦特的反极权现象学方法、阿佩尔的实用现象学方法等;再比如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方法论,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方法论,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社会批判学派的方法论,费耶阿本德、布迪厄“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等。可以说,正是这些纵横交织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促成并真正搭建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合流,从而催生了后现代主义解构方法的崛起以及新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建构一解构方法的普及。

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史表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悠久的历史,也有许多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在微观层次和操作层面有许多科学合理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sup>[3]</sup>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了方法论研究

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对许多重大方法论基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我们展开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性资源;另一方面又具有唯心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不仅会经常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现象主义、反人道主义的错误,也包含着诸多非理性、反科学的思想内容。西方哲学方法论不像自然科学方法论那样明晰而固定,它的发展史也不是知识或者信息的积累史,而是对永恒无解的哲学难题不断求解的历史,是各种不同求解方式与方法不断变更的历史,这类似于指向同一个圆心并不断变换基点的圆周运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就是方法论运动史,各种方法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具有平等的价值,对其应该秉持一种宽容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我们要自觉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缜密的思维,认真总结西方哲学史上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经验教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直面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思维矛盾与逻辑问题、各种理论桎梏与方法困惑,通过对新思想、新方法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以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世界性视野。<sup>[4]</sup>将方法论研究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思想性与工具性有机结合起来,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粗略陈述的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具体方法和初步构想与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加以对照,以马恩考察社会科学理论问题的那种融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为一体的基本原则为标杆,树立一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典范,更加注重社会实践的受动性和能动性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创新,以确保其社会科学方法论能够持续不断地展示旺盛生命力。

当我们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我们还必须认真考察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未来走向。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作为其思想表现和理论支撑,而且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研究和关注比我们早很多、深很多、丰富很多,因此我们应当向它们学习。西方社会文明进步是有它的社会科学理论表现和人文学科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应当有足够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视野,自觉地向它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无论在精神领域抑或在事实领域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成为其远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正当理由,更不应该放弃西方哲学方法论有价值的巧妙设计,相反,它不同寻常的优越之处恰恰在于竭尽所能地予以扬弃并实现视界交融。在方法

论上正如在世界观上一样,唯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走向“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与西方社会进步和西方科学发展相关联的,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科学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应当承认他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具有合理性。但是有时候西方人喜欢追求一种“片面的深刻”,把彼此相互关联的东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问题推向极端。比如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科学性与人性完全是可以整合的东西,而他们却要将其对立起来,致使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学派都只能在极端上进行思维,各自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又如个体和整体可以也应当在辩证的思维当中结合起来,可是他们却要将其分开来,致使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二水分流,互不相干。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论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有所警示。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中应发挥主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灵魂,我们必须自觉地加以坚持与捍卫。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实践不停顿,方法论创新显然也不能停顿;社会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与方法创新就要及时跟进一步。如果我们期盼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直接找到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们一定会失望,甚至还会动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关键在于坚持什么、发展什么,怎么坚持、怎么发展,如何在发展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为此我们必须积极自觉地走入当代中国,走入当代实践,坚持实践的研究方法而非纯粹理论的研究方法,正如列宁所说:“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sup>[5]</sup>

## 二、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

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角度厘清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这不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它得以实际展

开的关键步骤。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继承西方哲学方法而创立的、并由后人不断继承与发展的方法论科学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方法论原理,也是关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论指导大纲,那么,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应内在地表现为3个层次结构,即理念层次上的方法论、制度层次上的方法论和策略层次上的方法论,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结构。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则恰恰相反,首先是从策略层面开始,继而进入制度层面,最后发展到理念层面,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步步地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基本推演顺序之所以是从策略到制度再到理念,这主要取决于它当时所致力于解决的时代课题及其所蕴涵的历史逻辑,即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未来理想社会如何建立。基于这种历史性求解而形成的三大论域——社会主义实践方法论、资本主义批判方法论、未来社会发展方法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主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本着改造世界的目的而始终孜孜以求、着力阐述的重大方法论原则。而注重批判功能与建设功能自觉结合的这一方法论原则,具有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相一致的开放性特征,一再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当代的实效性,并主要通过其方法论上的“中西马合一”而获得了检验与证明。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sup>[6]</sup>,故而常常缺乏在高端引领方法论软实力的那种内在融通机制,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必须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科际整合力度,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世界视野与中国视野的内在融通水平与视域整合能力,借助西方各种方法论框架大力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中国话语、当代旨趣,在实践基础上全面展开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全方位、实质性的对话、引介与嫁接。同时应积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推向学术最前沿,不断增强其全球话语权、国际影响力与普世有效性。在方法论上实现中西合璧,早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自觉的学术取向,但总

体上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功能定位与批判分析,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汲取与升华,未能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立异相竞和协同展开,更未能充分实现两大方法论传统的问答逻辑与效果历史。因此,正视目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需要从方法论高度既加强内在超越与理性重建,又注重中西方法论上“重叠共识”的当代拓展,在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理性自觉与成熟。同时,应该看到,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运动总体上反应了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理性思维的最高成就,适应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它所刻意选择并主动保留的方法论原则,大大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理性思维逻辑的演进,它在方法论上对许多新领域、新问题的探讨,也不无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地方,不仅其巨大的进步意义、即使其明显的失足之处都曾带给我们以很大的方法论启迪。的确,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不再像西方哲学方法论那样,仅仅从纯粹的或者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来构建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方法论体系,而是直面社会化了的人类及其实践运动,因而通过对实践方法论意义的深刻考察,彻底地实现了对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内在超越并揭示了未来方法论发展的新方向。然而,这种“超越”非但不是对西方哲学方法论的颠覆或者终结,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与发展,是在“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规律支配下完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虑到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在诸多方面不仅增添了适合于目前时代特征的新方法、新范式、新思维,而且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所不曾有的、未充分展开的新的自我生成之域,在方法论上创造性地构建了总体适应后现代社会发展之时代精神要求的新理念、新原则。因而,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近现代转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步性与共通性,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同向建构大大高于它们的异质背反,这无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及其未来发展的严重影响。<sup>[7]</sup>

###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范式与未来设想

众所周知,“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3个基本原则。我国当代社会

科学论坛基于此而形成的方法论研究范式也大致分为3类:一是总体方法论(体系方法论)范式,包括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和当代人学方法论范式;二是分支方法论(部门方法论)范式,包括本体方法论范式(分为物质本体方法论、实践本体方法论、物质—实践本体方法论等)、认识方法论范式(分为主体性方法论、价值方法论、实践方法论等)、历史方法论范式(包括发展方法论、社会方法论、科学方法论、技术方法论、制度方法论等);三是个别方法论(具体方法论)范式,实际又可划分为文化方法论、生活方法论、生存方法论、语言方法论、人类学方法论、诠释学方法论等范式。这种方法论范式上的粗略划分,一方面,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对西方哲学方法论上的路径依赖:既有对其研究策略、制度安排、理念选择上的理性固恋,也有对其框架结构、基本图式上的简单比附,更有对其方法论原则和思想路线上的顶礼膜拜等;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对我国社会深层次变革的理性回应,是对传统西方方法论框架与原则的自觉扬弃和内在超越。各种方法论范式之间虽然论争不断,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宣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高度集中地体现在其特殊的实践方法论范式上,只有固守这一特殊方法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各种分歧才能消除,才能打通各种方法论之间的壁垒并形成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这种统领天下、归并各派的方法论奢望,极力主张特殊的实践性研究方法为唯一的科学性方法,其他的研究方法都应当悬置并应投靠到自己的实践派麾下。显然,这种以偏概全、归化各派的非分之想,虽然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宣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所具有的某种深层的合理性与广泛的解释力,然而,这却是以歪曲、割裂、抽象性的态度对待它原本有机性的方法论体系,会使它脱离辩证整合而不能成为当代方法论的思想精华。

事实上,当代“中西马”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融通,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无论在功能上或特性上,无论在西方视域或在中国视域,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跨界融合、纵横交叉的趋势。<sup>[8]</sup>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如果只注目于当代中国实践变革的现实需要而一味固守原有的基本方法,而不能不失时机地将蕴含于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智慧汲取并集中到自身上来,这样无论如何

不能开拓与活化其原有的方法论空间,更遑论获得使当代方法论研究向高层跃进和深度发展的可能方案。如果只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论并试图以之取代其他所有方法论精神资源,不仅其归化奢望最终只能成为泡影,而且还会在方法论研究领域形成新的桎梏。这表明,实践方法论只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分支和局部,虽然它是最主要的领域和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它无论怎样不能替代整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而存在与发展,唯有以上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三大基本要义为共同的时代立场,才能打通各个方法论研究视界,实现多元方法的和谐共进与界外联手。诚然,即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真的出现了多元取向的“差序格局”,实质上也不会妨碍整体性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的当代使命。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未来走向不可能被某一特定方法论范式和独特框架所支配,终会并存各种方法论探索并协同推进它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外众多方法论领域的文化合力将奋力引领它走向方法论研究的高端。<sup>[9]</sup>鉴于此,笔者这里提出一个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初步设想,以征询于学界:一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元方法论问题的研讨,集中回答什么是方法、方法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学习目的与要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性质如何。二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在思维方式、逻辑层级、基本范式、主要原则等方面异同的比较研究,旨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各自在思维方式上的合理性、通约性与同向性。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面临的诸多困难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庸俗化局限问题的研究,目的在于理清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应处理好的各种关系,如文本图式、问题图式与实践图式的关系,研究方法、表述方法与讲授方法的关系,知性方法、理解方法与操作方法的关系,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等。四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应注意的时代立场问题、中国方向问题、方法论史研究中的问题,与各门具体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的问题,与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何比较的问题等,旨在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找寻到多点支撑与多方点化,通过激活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融通古今中西的历史大视域,

以全面消弥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的内在冲突。<sup>[10]</sup>

####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指向

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以保持我们的主流价值取向和科学实践观在方法论研究上的正确引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要想让它在方法借鉴和领域拓展中不断得到跃迁,当然就要研究前马克思主义社会认识方法和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主要成就与缺陷,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革命性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探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转变历程,探讨它们如何在方法论上确保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朴素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说明它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转化的关节点与基本点。<sup>[11]</sup>但是,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要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分析其方法论的实践性本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方法论意义,因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最根本方法。可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指向是内在统一的,二者原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实践性本质就是通过它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表现出来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一是客观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要求。一切从对象出发,从客观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这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最根本的要求。社会历史活动中既有客观的物质的方面,也有主观的目的的方面,只有全面客观地加以反映,弄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客观性的根本要求。二是主体性原则。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活动的历史,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实践的基础,作为主体的人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以主体性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历史,首先应当注意到人在社会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同时还要注意到研究者所具有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含着求真、向善、达美,真善美的统一是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人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三是整体性原则。在研究社会

发展时,在观察各种社会要素、现象、个别事件时,头脑中要有整体思维方式,要把它们作为整体、内在的有机部分来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认识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的研究方法、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相统一的方法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种整体性原则的具体阐述。四是具体性原则。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抑或列宁都曾经讲过,真理是具体的,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适用于非常广袤的领域不一样,所有社会真理与适用性适用于特定对象、条件、场景、时区等。一旦脱离了这些具体条件,它们的真理性与适用性就会转化或者消失。对于社会的具体真理需要我们做定性、定量和定时的具体探索。五是发展性原则。马克思认为,以过程性方式来看世界,一定要注意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进化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趋势,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社会历史的发展前进也可能包含着倒退与曲折,正如人的某些机能在不断得到强化的同时,一定也会带来相关机能的弱化。所以一定要考虑到发展的成本、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显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所遵循的上述基本原则,不是彼此孤立、互不关涉的,而是内在统一、紧密相关的,在实际研究中很难将它们分割开来。

其次,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实践指向强调的是,我们的研究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是否具有实践指向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本质区别。历史唯心主义主张从观念出发,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主张“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sup>[12]</sup>。人类社会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因此必须把对社会的认识置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确立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可靠性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人们要生存,就要吃穿住行,为此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即生产人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活动具有双重意义: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在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即使是思想观念领域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理论的问题,本质上也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

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13]</sup>。实践的需要决定理论的产生,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体现。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适应了实践的需要,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真正的理论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sup>[14](P284)</sup> 实践的状况规定理论的任务,人们只能提出自己时代的课题。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表明,每一代人只能提出和完成自己所处时代的任务,而不可能超越时代,完成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任务。实践不仅规定了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且还为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手段。物质生产实践作为人的基本实践活动,不仅提供了理论研究的课题,而且创造了理论研究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使理论研究成为可能。

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实践指向,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从客观实际出发,就必须从问题出发。理论研究归根结底是对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问题、及时发现问题、深入研究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作为对社会生活考察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确立,决不是在观念中寻找,而应是从社会实践中去寻找。历史唯心主义考察社会的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从人的观念出发研究社会。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的方法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在现实中寻求研究的课题。当然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也是多样的。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要避免主观随意性,力戒平均使用力量。要从大量的、纷繁复杂的问题中,选择影响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战略问题,选择制约整体和系统的关键性问题。另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占有充分材料,而不能从原则出发。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从纯粹的思维出发,反对从观念出发,反对从主观臆想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又一本质区别。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不同于“价值中立”的方法。“价值中立”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带有唯客观主义色彩的一种方法论原则。“价值中立”者主张,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一旦选择了研究的课

题,就必须放弃任何价值观念。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并不等同于“价值中立”。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首先是社会的主体,无视主体的价值选择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sup>[14](P258)</sup>。可见,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科学性、价值性的高度统一、群众立场与实践指向的内在一致。弄清这一点,对批判“普世价值论”抑或“价值中立论”都极为重要。

### [参 考 文 献]

- [1] 董希望. 社会科学遇到合法性危机了吗——“社会科学方法论研讨会”综述[J]. 浙江社会科学, 2006(4): 221.
- [2] 李俊. 由社会科学方法论之对立和融合观照问卷设计的新发展[J]. 广西社会科学, 2009(1): 101.
- [3] 本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12.
- [4] 刘金伟. 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新视角——基于复杂性研究的思考[J]. 社会科学家, 2004(3): 65.
- [5] 列宁. 列宁全集(第29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139.
- [6] 袁汪洋.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困境与出路——从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比较的角度[J]. 天府新论, 2004(5): 78.
- [7] 曾令华. 文化科学的意蕴: 意义理解和价值判断——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6): 81.
- [8] 温凤兰. 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冲突及其消弭[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9): 46.
- [9] 吴晓明. 社会科学方法论创新的核心: 把握并切中当今的社会现实[J]. 浙江社会科学, 2007(4): 9.
- [10] 朱红文, 冯周卓.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和视角[J]. 求索, 2003(5): 160.
- [11] 郭强. 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40.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1.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6.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